

理论思考与教学探索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论文集（2017）

谢迪斌 卢海清 郑亚伟 崔艳红 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理论思考与教学探索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论文集（2017）

谢迪斌 卢海清 郑亚伟 崔艳红 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论思考与教学探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论文集：2017/谢迪斌等主编
一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3

ISBN 978 - 7 - 5623 - 5568 - 7

I. ①理… II. ①谢… III. ①高等学校 - 思想政治教育 - 中国 - 文集 IV. ①G64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5509 号

Lilun Sikao Yu Jiaoxue Tansuo: Makesizhuyi Xueyuan Xueshu Lunwenji (2017)

理论思考与教学探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论文集（2017）

谢迪斌 卢海清 郑亚伟 崔艳红 主编

出版人：卢家明

出版发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邮编 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 scutc1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020 - 87113487 87111048（传真）

策划编辑：罗月花

责任编辑：卢红兵 吴俊卿

印 刷 者：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5.75 字数：292 千

版 次：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目 录

文化自信：比较德育研究的价值导向	刘海春 李 婷 (1)
“三马”分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	谢迪斌 (11)
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郑亚伟 (24)
1950 年墨脱大地震与西藏地方政府对策研究	崔艳红 (33)
再谈公平与效率：为什么能统一	宋善文 (43)
提升职业使命感，做师德高尚的教师	杨韶刚 (52)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目的论”根底	张剑抒 (60)
从全盘西化思潮看中国道路的自信	申 波 (67)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回归生活的“四化”	雷艳芝 (77)
法治：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选择	刘云甫 (86)
广州高校青年教师婚恋观研究——“大龄未婚”现象的研究 与探讨	韩娟美 (93)
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下大学生法治教育问题研究	欧阳秋群 (99)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研究	汪 雪 (109)
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社会主义研究	黄胜海 (117)
创新扶贫制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赖洁莲 (125)
论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尔库塞的《历史唯物主义 现象学论稿》为中心	高海青 (135)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考	向海英 (147)
试论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兼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问题	曾 荣 (157)
过渡时期人民监督述论——基于对《人民日报》的考察 ...	周苏玉 (168)

略论周边安全新形势下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 机遇与挑战	李琪珍	(182)
简论中国现代民主实践与对抗战的再认识	朱月白	(191)
论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国际意义	郑德平	(199)
中国道路形象塑造的西方挑战和应对	刘毅强	(209)
国民党人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周智武	(219)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化自信问题探析	邓光芒	(229)
“不必腐”目标下制约监督权力运行保障机制的建构逻辑 与实现路径	洪 汛	(236)

文化自信：比较德育研究的价值导向^①

刘海春 李 婕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其中文化教育的主动输出是实施开放战略的关键部分。“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创开放包容的人文交流新局面，不仅要继承和弘扬“丝路精神”，还要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促进不同文明共同发展。“一带一路”虽然以经济合作为核心，但经济发展必然涉及技术的合作与价值观的交流，在此过程中文化是重点，教育是基础。换言之，“一带一路”开启了德育交流与互鉴的局面。“借鉴是人们进入比较德育研究的最原始的切入点”^[1]，比较德育研究通过对不同时空的德育进行比较，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与教训，以作为改革本国德育的借鉴。“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德育的交流与互鉴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我国德育在比较、借鉴与发展过程中自觉增强主动性、科学性与实践性奠定了平台。作为一种跨国家、跨文化、跨时代的研究，比较德育研究注重多维度、双向的借鉴与交流，在向世界学习的同时也将本国德育的理论与方法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在传播中国德育话语的过程中，只有对自身文化充满自信，才能为“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倡议提供精神支撑。因此，比较德育研究者要审时度势，积极响应与支持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在加大对我国和沿线国家德育研究的过程中，坚持文化自信的价值导向，更好地为中国的德育改革服务。

一、比较德育研究的时代价值

通过比较德育研究，探讨不同时空德育的本质联系和发展趋势，对于我国德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全球化浪潮、多元文化境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需求，对比较德育的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学者只有在

^①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研究项目（德育专项）《构建凸显“共青”特色的“四位一体”德育体系》（课题编号：2015DYZZ035）阶段性成果。

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做出战略性的回应，才能彰显比较德育研究的时代价值。

（一）政治上：适应全球化的浪潮

马克思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随着人们“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的扩大，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世界各国不可抗拒地被卷入到全球化这股浪潮中来。就政治层面而言，全球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协商对话的过程，面对环境污染、恐怖袭击、核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危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各种世界性或区域性的组织与各国成员共聚一堂，商讨对策，协商共识。政治价值观念、全球文化持续互动与交流的过程需要借助文化与教育去推动与实现。正如史铎姆奎斯特（N. P. Stomquist）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教育》所言：“教育作为在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中获得成功的手段如今也被赋予了很大的重要性”^[3]。唯有通过教育，才能寻求理解人类文化差异并建设彼此尊重差异的文化。比较德育研究就是从全球化的视角，研究德育的个性和共性，强调各国德育的平等交流与对话，相互理解与尊重，从而引导德育的多元对话。这不仅要求比较德育研究者在德育交流活动中与国际接轨，提高与世界各国的德育对话的意识和能力，还要在比较中认识自己，在比较中借鉴发展，尽快适应全球化浪潮。

（二）文化上：应对多元文化的影响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各种不同性质的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构成了我国德育发展所必须面对的思想文化大背景。国内外文化彼此影响的多元文化境遇对于我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在与国外德育比较的过程中，多元文化为我国德育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丰富了德育的思想资源。人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尤其是网络获取海量信息，客观上打破了过去人们进行道德、价值判断和选择的单一参照系。另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如何取舍国内外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引导人们走出道德和价值迷失的泥潭，摆脱信仰的迷茫和困惑，是比较德育研究者面临的巨大难题。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凭借其强大的经济优势、军事实力以及科学技术，对外大肆输出其价值观和文化产品，不仅加剧了文化间的交锋和冲突，也使我国德育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陷入被西化的危险。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追求物质至上、利益至上、金钱至上、个人至

上，这与我国传统价值观所坚持的忠、孝、礼、爱国、和谐是完全相悖的。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必然使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文化的整合与冲突同步呈现和增长。世界文化的舞台不可能被西方文化所占领，必然会出现多种文化相互交流、共同对话的新局面。这也正是比较德育研究的价值所在。面对多元文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比较德育研究既要注重各国德育根源性的差别，不失比较的前提，又要重视在差异中求同，不失比较的意义。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只有充分认识到比较德育研究的重要性，才能走出多元文化冲突的现实困境。

（三）经济上：满足“一带一路”倡议的需求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同时提出了“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建设路径。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民心通，经济合作才能事半功倍，不通则会事倍功半。如何实现民心相通？文化相通、价值观相通是一个重要支撑力量，只有通过文化与价值观的沟通，增进相互了解、信任和友谊，才能使沿线各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联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针对这些需求，比较德育研究成为实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重要突破口。一方面，比较德育研究立足于开放性的世界主义视野和研究方法，以尊重、理解不同文明、文化的差异性为前提，不仅注重对发达国家的德育研究，也将发展中国家的德育研究置于重要的位置。这与民心相通强调“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是一致的，有利于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克服“西方中心论”和单向的借鉴论，共造平等交流和互惠共赢的文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民心相通中的“民”指的是广大民众，其中人才精英在民心相通中起着关键和先导作用。比较德育作为跨时代、跨国家的研究，通过学科化、专业化的教育有利于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了解国内外德育的精英，为“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经济合作提供一批强大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队伍。无论是比较德育研究的视野、方法还是人才培养的过程，都为“一带一路”战略夯实了民意基础，能“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4]。

各个国家、民族及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和交流已成为无法拒之门外的潮流。面对全球化浪潮、多元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需求，比较德育研究只有明确自己的价值导向，才能增强德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创造德育的本土特色。

二、比较德育研究必须坚持文化自信为价值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讲话中，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相结合，传递了治国理政的新内涵。所谓文化自信，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在德育“参与、互动、对话”过程中，比较德育研究只有坚持文化自信的价值导向，才能在比较中不迷失自己，在比较中寻找德育发展的规律，从而明确研究目的，为中国方案提供“文化德育”。

（一）坚持文化自信是避免迷失自我的重要前提

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和借鉴显得尤为重要，但学习、借鉴并不等于“拿来主义”和“全盘否定”，否则国家和民族很容易在多元文化大潮中迷失自我。然而，有些学者在比较德育研究的过程中，表现出对传统德育的唾弃践踏以及对国外德育的推崇至极，这实质上给中国文化的“自卑”心理埋下了伏笔。文化自卑是对待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轻视、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和心理，是迷失自我的真实写照。文化自卑一方面表现为全盘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对西方文化价值的一味鼓吹。这种自卑心理的蔓延给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埋下了伏笔，直接影响到我国德育的长足发展。文化自信的另一个极端是文化自负。文化自负是对自身文化自满自足和狂妄自大的态度，力图将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化。在比较德育研究中对文化的故步自封折射的也是对外来德育理念的恐惧和戒备心理。这不仅背离了比较德育研究的价值意义，还有可能失去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机会。无论是文化自卑还是文化自负，都是一种对比较德育研究的片面的态度。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德育，比较德育研究吸收借鉴他国有益的成果并不代表对国外德育内容和方法的照抄照搬，对本国优秀文化的坚守也不意味着对国内德育内容和方法的因循守旧，只有在多元文化大潮中坚守文化自信的价值导向，跳出文化自卑与文化自负的窠臼，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寻求新旧之间、国内外之间的契合点，比较德育研究才能避免迷失自我，才能有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落脚点。

（二）坚持文化自信是明确比较德育研究目的的坚实基础

对于比较德育研究的目的，学界的看法主要分为“借鉴论”与“交流论”。“借鉴论”认为比较德育研究的目的就是在探索规律、发现趋势，为改进本国的德育作借鉴。同时也呼唤借鉴本土化，认为应通过比较探索世界

德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再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促进中国德育的发展。“交流论”则强调以各国间的德育交流为目的，异国文化的理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他们在处理国内外关系时也注重“本土生长”问题，即立足于本土社会道德教育的实际情况，依照本土文化发展的逻辑来思考和构建自己的德育内容和方法。比较德育究竟为何研究？对于这个问题，坚持文化自信的态度对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首先，文化自信明确了比较德育研究的价值取向——“为我所用”。毛泽东曾指出，“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成分：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5]。无论是通过德育的借鉴抑或交流，比较德育研究在处理“我”与“他”关系的同时，都不能脱离对“我”自身的研究，这种呼唤“本土化”或“本土生长”的支撑点就是来源于文化自信。其次，文化自信明确了比较德育研究的话语任务——“为我发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6]。比较德育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学科，其研究者不能盲目迎合和全盘接受国外德育话语和理念，而要在德育借鉴或交流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德育的发展，甚至在世界传播“中国德育话语”。这种话语传播的自信力实质上就是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自身话语毫无底气可言，更难以从容应对多样文化的价值交锋。从比较德育的价值取向与话语任务层面上看，只有立足本国，坚持以文化自信为价值导向，把本国的德育改革作为比较德育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德育改革服务。

（三）坚持文化自信能为中国方案提供“文化德育”

为世界文明多样化发展提供中国方案，是传播中国德育话语以及重塑中华民族世界形象的重要途径。中国方案必然被赋予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其中“文化德育”是中国方案的理论根基。所谓“文化德育”，是以先进文化为核心的德育，即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的，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的德育。这与比较德育研究坚持“批判性、继承性、发展性”^[7]的研究原则是相互契合的。那如何能为中国方案提供“文化德育”？这同样不能背离文化自信的价值导向。文化自信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赢得他国对本民族文化历史与文化的尊重，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交流中的自主性和话语权上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灾难深重的历程，不断促使我们自觉反思指引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精神指向，积极探求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时代发展路径。经过一百多年来前赴后继的努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发展，校正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方向，党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实地推进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下一个百年历程。正是由于思想文化进步、经济的强盛、体制的创新以及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才更加坚实。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文化自信为新世纪中国的崛起注入了重要动力，为中国方案提供了“文化德育”。“文化德育”一旦形成就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力量，通过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想信仰和行为规范，通过评价、言说、交往等方式，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发展。它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是建立一系列道德规范的价值尺度，在全球化浪潮、世界多元文化中能为中国方案提供最有力的支撑。

三、比较德育研究中如何坚持文化自信为价值导向

文化自信不仅仅来自于中国文化悠远的历史，也得益于三十多年来中国快速的发展和崛起。在文化多元共存的全球化背景下，比较德育研究如何始终坚持文化自信为价值导向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厘清文化与德育的关系

1900年，萨德勒就曾强调，“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不能随便漫步于世界教育之林，犹如一个小孩逛花园一样，不时地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下一朵花，从另一棵树上采一些枝丫，并期望如果我们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在本国的国土上，我们就能拥有一棵茂盛的大树。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是遗忘了的斗争和艰难以及‘久远前的战斗’的结果；其中隐含着民族生活的一些神秘作用。”^[8]这种“神秘作用”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只有在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因此，能否厘清文化与德育的关系直接影响我们对比较德育研究和文化自信的认识。

人类的出现伴随着以“文”化“人”活动的开始，这意味着文化与德育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人类在创造精神文化的同时，也是在道德教育的过程。正如著名的教育家陈序经先生提出的：“人类是文化的动物。有了人类，必有文化。文化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同时发生。”^[9]文化与德育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二者是一种相互包含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体现在：一方面，文化是德育的本质，对德育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德育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的形态、内容、精神，德育就变成无本之木、无源

之水。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本主义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的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0]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在吸收人类知识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对德育的作用可见一斑。文化蕴含着源源不断的德育资源，既丰富了德育发展内容，又为德育活动提供了重要载体，如名胜古迹、文化书籍、传统节日、民间艺术等。另一方面，德育是文化的体现或反映，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德育随着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必然是文化的体现或反映。一定的德育理论、内容、方法也构成了该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可见，德育一直扮演着文化大使的角色，担负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从上古时期儒学的道德教化思想，到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无不是对历代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过程。

（二）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什么态度认识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教育，是比较德育研究者在思想上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11]。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了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从比较德育研究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是党和国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高度体现，是有效防止西化、分化和丑化中国的思想武器。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建设就失去了魂，就没有了方向和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强大精神力量，充分展示了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源动力。在比较德育研究中坚持文化自信的价值导向，实质上是要捍卫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有利于夯实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引领社会思潮，汇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还能有效地抵御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渗透。

为此，在文化上有自信，就是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关键。一方面，要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讲好“中国故事”。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向世界讲述一个追求富强、民主、和谐、进步的现代文明国家的真实故事，这是文化自信的充分写照。比较德育研究必须秉持文化自信，大力弘扬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和时代性，增强中华文化的穿透力、吸引力和感染

力，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能力，传播好“中国声音”。一直以来，西方媒体占领了国际信息传播的主导地位，曾有意无意地对中国形象进行歪曲和破坏，制造了与中国意识形态或社会矛盾有关的负面新闻。面对如此恶劣行为，中国必须在提高综合国力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让国际社会听到“中国声音”。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贯穿到国际交流中，充分激发公共外交的潜力，以文化自信为价值导向，发挥社会和民间外交传播“中国声音”的力量。

（三）挖掘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

文化自信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其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的充分肯定。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历史变迁而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源，也是我们最宝贵的文化软实力。然而，在比较德育研究中，西方文化不断渗透、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肆意泛滥的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被遗弃在历史的长河中。尼克松在《1999 不战而胜》中指出：“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2]。他也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凝聚和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可见，积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保证中华文明生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保障，是推动民族复兴的独特“战略资源”。

挖掘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独特创造、价值理念梳理清晰，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道德修养的内容，其中许多的思想道德观念和规范，如“仁爱孝悌的道德精神、谦和好礼的处世美德、诚信知报的善良品德、精忠爱国的民族气节、克己奉公的集体精神、修己慎独的道德修养、见利思义的道德取向、勤俭廉政的优良品质、笃实宽厚的质朴品格以及勇毅力行的坚强意志”^[13]等等，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洗礼后，仍具有重要的德育价值。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德育内容的思想结晶，必须梳理清楚呈现在民众面前，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14]。

（四）坚持文化创新推动德育发展

全球化时代下，德育研究原创性的呼声日益强烈。关于教育理念、理论与经验的本土化研究也成为当代比较德育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在与西方德育的比较过程中，不难发现我国基本上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能够影响世界的教育发展的教育经验和教育理论少之又少，在文化影响力上“中国声音”还是不够响亮、“中国精神”还需宣扬。更需要反思的是，中国有的德育研究变成了西方的复印机和传声筒，他们对西方学者的德育观念和话语体系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并自认为这就是“文化创新”的体现。比较德育研究要明确，文化借鉴只是研究的手段，文化创新才是研究的使命所在，只会“鹦鹉学舌”般运用别人的话语系统来开展研究，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对其他文化的超越。

因此，比较德育研究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坚持创新发展，建构起中国特色的“文化德育”。一方面，文化创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文化创新渊源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脱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会失去文化生长的根基和中国特色。文化创新也要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紧密相连，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不断推进中国化发展，体现了中国文化不拒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成果的优秀品质。正如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精华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作了系统的论证，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另一方面，文化创新要坚持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在一个民族范围内，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任何一个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改造与创新都是依托在文化传统的肩膀上完成的，同时也与社会现实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坚持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扬弃与创新，是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当代中国文化传统的本质要求。文化创新必须给传统文化应有的历史地位，既要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和优良传统，又要准确把握世界德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精神文化领域之中。

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比较德育研究如何能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宣扬“中国精神”，文化自信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导向。在处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关系的过程中，比较德育研究唯有坚持文化自信的价值导向，才能不断增强德育的主动性与本土特色，推动我国德育的改革和发展，

从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 [1] [7] 李萍, 林滨. 比较德育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1、13.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5.
- [3] Stomquist N P. Educ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Connectivity of Economic Power,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M].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2. Pxiii, xiv, xxi.
- [4] 新华网. 习近平: 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htm, 2013-10-25.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七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82-83.
- [6] 人民网.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EB/O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519/c64094-28361550.html>, 2016-5-19.
- [8] 赵中建, 顾建民. 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 [C].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113-115.
- [9] 陈序经. 中西文化的出路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
- [10] 列宁. 列宁选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62.
- [11] 新华社.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4-05/05/content_2671258.htm, 2014-05-05.
- [12] 新华社.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讲话 [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4-09/24/content_2755666.htm, 2014-09-24.
- [13] 李惠民. 中国传统文化新编 [M].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出版社, 2011: 328.
- [14] 新华网. 习近平的两会时间: 妙言隽语纵论国计民生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5-03/08/c_1114560753.htm, 2015-03-08.

“三马”分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

谢迪斌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创立 160 多年以来，经济条件与社会环境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随着这种变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实践方案也一直在不断发展。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各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解，结合各自对本土实际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充实和创新，对实践方案进行了调整和修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演进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具有明显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与实践方案。本文所讨论的三种马克思主义（“三马”），主要是指理论上形成完整体系，在实践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三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案：西方马克思主义、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三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都是马克思主义，但在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特点，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更重要的是，当今的存在状态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形成了“三马”分流的局面。“三马”分流的历史进程，导致了当下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存在的理论谱系与实践模态^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实践道路的形成，就是“三马”分流的结果之一。考察“三马”分流的历史过程，分析“三马”分流的内在规律及其成败得失，对于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种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都在 20 世纪初期，相差不到 10 年时间。这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一是恩格斯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再也没有一个最权威的旗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与表达，就不再有统一的规范与标准的格式。各个国家的理论家主要从自身的标准来理解和表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每个人的标准与视角不同，所诠释和阐发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必然产生较大的区别；二是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首先要面对各自国家面临的问题与矛盾，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世界统一性被第

^① 参见顾海良、梅荣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2、14、17 页。

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所消解，同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利益问题是对立的，民族利益和国际同盟出现了背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工人无祖国”的命题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各国马克思主义在各自利益基础上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会有不同的经验概括与理论抽象；三是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预见到的一系列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特别是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形势高涨。理论需求越来越旺盛，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这些国家革命的理论供给严重不足，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加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的再创造，以保证本国革命紧迫的理论需要。正是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推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进入一个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创造和实践再探索的高潮。在这种高潮之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然也就出现多种方向，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本文所要论述的马克思主义三种主要流派就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高潮的最典型代表。

一、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缘起及其演进

在三种影响较大的马克思主义中，产生得最早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它的直系源头是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到俄国，并由此而传播开来。列宁等一大批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因为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后来在俄国影响越来越小，在十月革命之后就消失了^①。因此，这一理论不能列入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序列。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点是 1903 年，这一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分道扬镳，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内甚至全俄的马克思主义最主要思想（这一派别在党内选举中成为多数，俄语称之为“布尔什维克”）并用于指导俄国革命的实践^②。这一理论出现之后，经过列宁等人的理论创造与实践检验，逐渐变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到列宁去世为止，这一理论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观点内容。对这种早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将其概括为列宁主义。当然由于列宁逝世较早，有些重要

^① 尚伟：《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32 页。

^② 刘庚岑：《苏共历次代表大会简介》，《苏联东欧问题》，1985 年第 6 期。